

序

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 的歷史背景、作用與經驗

近年來，人們在關注、研究 20 世紀 80 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特別是中國農村經濟改革與發展的歷史時，包括我自己在研究 80 年代民間政治、思想史時，都不約而同地注意到了「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下文簡稱「發展組」）。如本書的作者——我曾經的學生，此後近半個世紀的摯友孫方明所說，這是「一群自願者」的自由組合，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發展組是今天已經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自願者組織的濫觴。但它卻「頗有深度地參與了高層決策」，在 80 年代的改革中發揮了相當重要而獨特的作用。後來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的一部分成員參與籌建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如一位美國研究者所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創造了第一個為中央政府工作的同時，又在研究、人事和財務等方面，擁有高度自治權的研究機構」。^① 有了這類機構，這批平均年齡 30 歲左右的中國年輕人的志向、才能在 80 年代中國經濟、政治體制改革中得到充分的發揮。可以說，這是在 80 年代中國政治、經濟的特殊條件下，所實現的國家與民間力量的結合與良性互動。我們可以通過對發展組的研究，揭示 80 年代中國改革尚未被人們注意和認識的某些重要側面；其中的經驗、教訓，對我們今天的改革和發展，仍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啟示意義。

我注意到，發展組的一位成員在一次總結會上，談到小組

①（美）凱薩琳·奎塞：《毛以後的中國專業化研究：體改所與政策制定》，大風出版社 2008 年，第 113 頁。

的成立與發展，說了兩條：「一是我們自願到組裡的；二是時代提供了可能」。那麼，我們的討論就從這裡開始：主觀上，經過了怎樣的思想歷程，這群年輕人「自願」地聚集在「研究中國農村發展問題」這一歷史聚焦點上？客觀上，他們又遭遇了怎樣的歷史需求和條件所造成的時代「可能性」？

思想、歷史、社會背景

我們的討論，要從文革後期的民間思考說起。——要真正瞭解 20 世紀 80 年代的中國，就必須對 70 年代的文革後期，有一個基本的認識。

發展組的主要骨幹和基本成員，都是下鄉知青或有農村工作經驗的大學生、中專生。我曾經說過，這些生長於四五十年代的一代人，他們經歷了文革的狂熱之後，終於把自己的腳落到中國這塊土地上，他們獲得了真實的中國體驗，真正瞭解了中國的國情，建立了自我生命和底層人民的深刻的精神和情感的聯繫，這對這一代人的成長，以及未來中國的發展，都是意義重大的。應該說，這也是發展組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基礎。這也是中國革命，包括文化大革命所造就的一代人的特殊經歷和特殊思想情結，既有別於我們這樣的五六十年代的大學生，更有別於此後的 60、70 以至 80 後的幾代人。

伴隨著下鄉運動的深入，特別是 1971 年林彪出逃以後，在這一代年輕人中，普遍有過一次精神的危機，對原有的革命信仰，產生了深刻的懷疑，並因此引發出深入的新的思考。如近年一些研究者所說，形成了各種「民間思想村落」。年輕人以各種形式聚合起來，主要討論和解決兩個問題：首先是面對自身：「我們到底要追求什麼？」更是面對事實上的文革的失敗：用革命的方式來解決中國和世界的問題，這條路走不通了，那麼又應該走一條什麼路？也就是說：「中國向何處去？世界向何處去？」這樣的問題，尖銳地提到了這一代願意思考

問題的年輕人、民間思想者的面前，成為思考的中心。——這也是以後發展組的一切思考的基本出發點與歸宿：他們所要回答的正是文革結束後的歷史轉折期，「中國向何處去」和「怎樣走」的問題。而在發展組年輕人的眼裡，「中國向何處去」又必須置於世界發展的大背景下，是與「世界向何處去」的問題，聯繫在一起的。這樣的胸襟、視野也是屬於這一代人的。

文革後期的民間思考者中的敏感者，已經意識到，中國即將發生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鉅大轉折和變革，他們的任務，是要為這樣的轉折、變革，作好思想和人才的準備，鍛煉理論的武器。——後來成為發展組的發起人和主要組織者的陳一諮，就是其中的一個代表人物。陳一諮在北大讀書時，即立下了高遠的志向，他在1963年就提出：「國家各部門，尤其是農村，需要大批有作為的、立志改革的人才，今天農村出現的問題太多了。但深入農村幾年、十幾年，研究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各種問題的人是太少了」。^②因此，他大學畢業被分配到河南駐馬店地區，就抓住機遇，在擔任一個公社書記時，創辦農業大學分校，在那裡聚集了一批人才，後來成為發展組骨幹的鄧英淘、羅小朋、孫方明等，都曾在那裡相聚、相識，而他們當時就已經非常重視對理論問題的討論。這也就成了發展組最初的思想與組織準備。發展組後來對「中國的實踐理論化」（鄧英淘語）的特殊興趣，也是那時奠定基礎的。

根據我近年的研究，面對中國在文革後期紛紜複雜、堆積如山的問題，民間思想者在「現行體制、路線、指導思想、政策再也不能繼續下去，必須進行改革」這一點有著高度共識；但在「中國問題的核心、要害在哪裡？」以及「未來中國的變革從哪裡入手，怎樣尋求突破口」問題上，卻有著不同的認識。大體有三個思路。其一，是強調中國的主要問題，是在社會主義體制下出現了「特權階級」，因此，改革的重心應該放在現行國家政治體制的改革上，其代表人物陳爾晉還具體提

^② 參看錢理群：〈60年代校園地下新思潮〉，收《拒絕遺忘：「1957年學」研究筆記》，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年。

出了通過「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取締官僚特權，尊重勞動者主權，建立「人民管理制」的主張。其二，是以李一哲為代表的，認為中國的當務之急是要解決文革中的「法西斯專政」的問題，因此，呼籲「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同時發出的，是發動「無產階級的思想啟蒙運動」的召喚。其三，是我所稱的「農村體制改革派」，其代表人物就是後來成為發展組的組織者與主要骨幹的陳一諮和張木生。

首先在理論上亮出旗幟的是張木生。他早在1968年秋就寫過一篇〈中國農民問題學習——關於社會主義體制問題的研究〉的長文，在部分知青中廣泛流傳，引發了激烈的討論和爭論。他提出了四個相關聯的問題：中國問題的關鍵是「要讓老百姓過好日子」；因此，根本問題是「發展生產力」；而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的改革」，其起點和希望應放在中國農村；而農村的改革又要從人民公社體制的改革入手。這樣的思路和陳一諮在河南駐馬店所思考的問題，應該說大體上是一致的，他們後來在發展組走到一起，不是偶然的。這就意味著，陳一諮和張木生，或者也包括後來發展組的朋友們，從他們對中國國情的理解和把握，同長遠發展的思路出發，作出了三個重要判斷。其一，中國的改革，不能脫離中國大多數老百姓的基本要求，必須首先解決「六億人口的吃飯」問題，這其實正是中國近現代社會發展的一個基本歷史要求（此外，還有「國家的獨立與統一」，這構成了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三大歷史任務），這也就要求必須從文革達到頂點的革命狂熱回到現實，從烏托邦理想回到生活常識，這是一個首先的基本覺悟。其二，中國的改革，也不能完全脫離現行的體制，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一黨專政的體制的改變，需要經過長期的過程，首先應該做的是促成其改革，而不是主觀設計一個新體制去取代它，而且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從底層黨員，到中層幹部，到上層領導，經過文革的教訓，正孕育著鉅大的改革欲求，因此，中國的改革的重心，必然是體制內的改革。其三，中國的基本國情決定了農民問題的特殊重要性，農村也是計劃經濟體

制最薄弱的環節，中國的改革必須選擇以農村改革為突破口。

正是基於這樣的對中國國情的基本認識和把握，他們確定，既不走徹底的國家體制根本改革的激進主義道路，也不選擇通過體制外的街頭政治，爭取以民主為中心的政治體制改革的道路，而是另擇新路：一是致力於農村體制改革，二是努力推動體制內的改革。應該看到，當中國面臨這樣一個深刻的歷史性變革，這三條改革思路，並不對立，而是相互補充的，它們有著改革目標的內在一致性。但同時也是基於對中國問題與改革的不同認識而作出的不同選擇。陳一諮和張木生還未雨綢繆，從文革後期起，就嘗試和黨內的高層接觸，他們在 1971 和 1973 年就分別和胡耀邦有過深入的交談。陳一諮彙報了他所看到的農村十大問題，胡耀邦大為讚賞：「認識中國，改造中國，不瞭解佔人口 80% 的農民，只能是空談。青年雄心壯志和廣大民眾的利益結合起來，才會大有希望」。^③ 這樣的底層和高層的直接交流，也為以後的上、下結合奠定了基礎。陳一諮和鄧力群的交往，也是從這時開始的。以後發展組的成立，就和這樣的交往，直接相關。^④

歷史終於走到了轉捩點：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垮臺，就為這些早有準備的民間思想者，提供了一個將自己的思考轉化為政治、思想、社會實踐的歷史機遇。

有意思的是，首先行動起來的，是主張政治體制改革的派別，李一哲的主要作者王希哲、陳爾晉等人都自然地主動投入，在 1978~1980 年以「西單民主牆」和以後雨後春筍的民間刊物為中心，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社會民主運動，其主要訴求，就是憲法所規定的思想、言論、出版，特別是結社自由，而且採取的是體制外的街頭政治方式。而在 1978 年恢復高考以後，民間思想者也發生了分流，一部分仍堅持體制外的反抗，而相

③ 轉引自印紅標：《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9 年，第 247~249 頁。

④ 以上關於文革後期的民間思想的討論，詳見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歷史的另一種書寫》，即將出版。

當多的部分，卻進入了高校和科研機構，其中最具有行動力的部分，就在 1980 年發動了以競選為中心的校園民主運動，和社會民主運動相互配合和支持。值得注意的是，競選運動一開始，就提出了中國的改革「最應該抓住的『最關鍵的一環』，那個能撬動整個改革運動的阿基米德『支點』是什麼」的問題。而競選人也因為對這一問題的不同選擇，而分為主張政治體制改革當先的激進派，和從經濟改革入手的穩健派，但他們也有兩個共識，即中國的改革應當是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社會的全面改革，中國的改革必須走上、下結合的道路。

在開始時，這樣的民間社會民主運動和黨內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之間，在反對掌握了黨和國家權力的「凡是派」的鬥爭中，有過體制內外的相互配合，校園民主運動也得到了基本的肯定，以致在中國，第一次出現了自上而下的改革與自下而上的改革良性互動的可能性。但社會民主運動和校園民主運動所提出的言論、出版、結社自由等政治要求，卻被鄧小平視為對黨的絕對領導地位的挑戰，在他看來，改革開放只能在中國共產黨一黨主導下，任何對黨的絕對權威的挑戰，都會造成社會動蕩，而不利於改革。因此，他先宣佈西單民主牆為非法，後又於 1981 年 2 月 20 日發佈指令，取締一切民間刊物和民間組織，從根本上否定了社會民主運動的合法性。

但民間改革運動自有其客觀歷史邏輯，是阻擋不住的；民間的改革力量也依然存在，只是在政治的高壓下，需要尋找新的發展方向、路線、方式和發展空間。^⑤

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正是在這樣的時刻走上歷史舞臺：它正式成立於 1981 年 2 月 12 日。發展組的成立和民間組織的被取締，發生在同一個月，這當然是偶然的；但終結與開始的同時性卻是必然：當體制外的民間運動受到壓制，體制內的改革的民間參與就開始了。

^⑤ 以上關於 80 年代民間運動的討論，詳見錢理群：〈1978~1980 大陸社會民主運動〉，〈1980 年大陸校園民主運動〉，文收《我的精神自傳——以北京大學為背景》，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2008 年。

而發展組於此時的成立，還有更深刻的背景。

當中國的上層還在為中國的發展道路、改革路線發生複雜的政治（包括政治權力）和思想鬥爭，民間的社會運動也在城市底層轟轟烈烈地進行時，中國的農民，也用自己的方式，作出了選擇。大概就在 1978、1979 年間，由安徽發軔，貴州、四川、甘肅、內蒙、河北、河南、廣東等省、自治區的一些貧困社隊的農民或明或暗地突破禁區，搞起了包產到戶或類似的包乾到戶。——正是中國農民進行的突破舊體制的變革行動，為中國的改革創造了新的可能性，提供了新的歷史機遇，就看誰能夠抓住它。

陳一諮於 1979 年初經胡耀邦同意，鄧力群批准，調回北京，安排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工作。他對西單民主牆為中心的社會民主運動和湧動的各種社會思潮，進行了冷靜的觀察與思考；在繼續保持和上層的聯繫的同時，廣交朋友。如前文所說，由於 1977 年恢復高考，全國各地早有準備的青年才俊、民間思想者雲集北京各高校和研究、出版機構。他們中一部分人捲入了校園民主運動，更多的則和陳一諮一樣，進行緊張而冷靜的觀察與思考，並以各種方式相互串聯，形成各種大大小小的思想學術沙龍。後來參加發展組的最初的骨幹，前面提到的張木生、鄧英淘、羅小朋外，還有何維凌、王小強、白南生等就逐漸聚集起來，並開始認真討論「中國向何處去」及「怎麼走」的問題，「在各種可能性中評估現實性」。

一個偶然的機會，陳一諮瞭解到了安徽包產到戶的情況，而如本書作者所說，「他對實踐的東西有足夠的敏感性，喜歡去探究實踐中產生的新東西」，於是立即前往安徽農村進行實地考察，並於 1980 年 7 月提出了《關於安徽省農村實行「包產到戶」的考察報告》，用大量的事實材料、統計，說明：包產到戶不但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生產力，取得了鉅大經濟效果，而且改善了農民的地位，使農民開始有了直接管理生產勞動、產品分配、自由安排自己生活的「自主權」，維護了農民的基本權益，同時改善了農村幹部與群眾的關係，開始解

決幹部「特殊化」的問題，並預見到，包產到戶將引發中國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刻變革，進而為「如何走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以及社會主義的階段性和我們處於什麼階段的問題」，以及如何處理公有化和按勞分配的關係，「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的相互關係」等重大理論問題，提供新的思路。陳一諮最後旗幟鮮明地提出：「包產到戶是中國農民在我國社會主義實踐中的偉大創造。正是這個偉大創造使人們看到了我國農村的曙光，而農村的曙光就是中國的希望！」他同時尖銳地指出：在農民的創造面前，國家、政黨和每一個人都面臨考驗，「多年來，我們習慣於拿某種理論裁剪生活，而不是實踐檢驗理論；習慣於用某種模式硬套社會，給出一個大致的政治結論，忽視從大量事實出發作出科學的論斷」。現在的問題是，要走出這樣誤區，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不是自然界和人類去適應原則，而是原則只有在適合於自然界和歷史的情況下才是正確的」。

陳一諮隨即和他的朋友一起，進行了更深入的討論與論證，並達到了共識，這主要集中在後來以「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的名義正式發表的〈認清國情，加強農村發展的綜合研究〉一文裡。^⑥ 文章主要提出了和討論了兩個問題。

首先是中國的發展道路和改革突破口的選擇問題。文章總結了世界經濟向現代演進的歷史經驗，指出：「農業發展在一定經濟發展階段決定整個國民經濟狀況這一規律，同樣適用於中國」，「在落後國家，沒有眾多的農村人口的參與，任何經濟起飛都是無法想像的」，「一部分不發達國家無視農村問題的極端重要性，企圖跨越階段去追求片面的工業化的做法，已經給它們的發展帶來了嚴重的損害」，「如果不把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村社會的進步放到一個民族走向現代化的戰略地位來認真對待，就會釀成歷史性的重大失誤」。文章更進一步強調：「中國的特殊國情，賦予中國農業經濟發展和農村社會進

⑥ 〈認清國情，加強農村發展的綜合研究〉一文收《農村·經濟·社會》第一卷，知識出版社1985年。

步以更為特殊的決定意義」，「十億人口，八億農民，是中國最基本的國情」，而中國建國以來，最大的失誤，就是「一方面脫離了農村經濟發展的現實水準，追求一種農民平均主義的『一大二公』模式；一方面忽視廣大農民的經濟利益和要求，片面強調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的優先發展。其結果，是我們長期不能改變農村的落後面貌」。中國自己的發展經驗證明：「農村的事情沒有辦好，中國的事情就不可能辦好；農民貧困，國家就不能富強；農村停留在古代，中國就無法現代化」。結論是：中國的改革必須建立在經濟發展和滿足人民的基本生存要求的基礎上；而中國的經濟發展，絕不能走片面的工業化的道路，而必須把農業的發展和農村社會的進步置於國家現代化的戰略地位，並以農村改革作為中國改革的突破口。

其次，文章尖銳地指出了中國農業問題研究現狀的問題：「農村問題最重要，卻最不受人重視；農民人數最多，研究農村的人卻最少；農村問題牽涉面最廣、最複雜，對它的研究卻最狹隘、最貧乏」，「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 20 年來我們在農村政策上一系列的失誤，和不可避免的紊亂。農業經濟理論研究的這種落後狀態，是造成國民經濟發展遲緩的重要原因之一」。——這裡，實際上是提出了三個層面的問題：農業的發展，農村的改造，必須有一個適合中國農村發展實際的科學理論、戰略和政策，這是減少改革的盲目性、隨意性與多變性的關鍵；而科學的理論、戰略、政策又必須建立在科學的研究基礎上；而「中國農村是一個極其複雜的特大系統，包括著環境、經濟、社會等多方面的極其豐富的內容，每一方面的內容又包含有不同的層次和諸多的因素」，這就不但要求農業、農村問題的研究必須是「多學科的綜合研究」，而且要把作為「基礎理論研究」與「應用研究」的中間環節的「戰略研究」放在突出的地位。

這樣，這批有志於為中國的改革作出自己獨立貢獻的年輕人，就在 20 世紀 80 年代初中國歷史的轉捩點，找到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和位置：「站在中國農村發展和中華民族振興的立場

上，按照歷史發展的要求，探索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尋求中國農村發展的基本戰略」。於是，就有了「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小組」的自我命名。「農村」是他們的基本立足點；「發展」則表明了他們著眼於農村「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全面綜合發展」的戰略眼光；「研究」則是他們的基本定位：通過專業化的發展戰略的研究，來為中國的改革，特別是農村的改革提供理論支持，並為最高領導層的決策提供諮詢，進而影響中國改革的方向和進程。這樣，就和在此之前的以直接發動民眾的街頭政治的方式，以促進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的民間社會運動區別開來，也不同於政府機構和學院裡的體制內，缺乏相對獨立性的研究；它是以民間研究者的身份，推動的以農村經濟和社會改革為突破口的，漸進的，體制內的改革。——這在當時中國的歷史條件下，是一個相當獨特的選擇，即他們要在「官方」與「民間」之間的灰色地帶，來尋找和拓展自己的發展空間。這就在激進的民間運動遭到鎮壓以後，為民間改革力量的聚集和繼續發揮作用，打開了一個新的空間，這是以一種更加曲折的方式來實現上、下結合，政府主導與民間參與的結合。

更重要的是，當時的中國，也確實存在這樣的特殊形態的民間參與的客觀需要，條件和可能。

這就要說到另一個重要的歷史背景：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對農民的包產到戶的自發選擇和要求獨立自主地位的歷史願望的態度和回應。前述〈認清國情，加強農村發展的綜合研究〉裡，對此也有過一個分析：「中國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在中國，無產階級的領導，首先和主要的就是對農民群眾的領導；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首先和主要的，就是與農民運動這個最大的實際相結合」。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基本性質與傳統，就決定了它們在這新的歷史轉捩點上，認可中國農民的選擇，尊重農民的願望，相對比較容易，這是和以後的政治體制改革大不一樣的。不僅是黨的基層幹部，而且相當多的中、高層幹部，都和農民有著深厚的精神與情感的聯繫。本書所說的，對發展組的成立、發展起到了決定性作用的

「兩個人」（時為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作為改革開放初期「中央高層的主要參謀」的鄧力群；時為國家農委副主任，後來是中共農村政策制定的具體主持者的杜潤生），發揮了重要作用的「三個人」（時為社科院農業經濟所第一副所長的王耕今；時為北京大學經濟系黨總支書記的楊勛；時為萬里秘書，後兼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吳象），就都是這樣的代表性人物。鄧力群在發展組成立會上，一開口就說：「我對農村有所瞭解，也有感情，聽到有同志願意做農村工作，就覺得和自己心心相印」，在他看來，「不瞭解農村，就不能說瞭解中國；農村的事，沒有辦好，中國的事就不能說辦好了」。他語重心長地對年輕人說：「一個中國人，眼裡沒有八億農民，不能不說是認識上的很大的缺陷。就青年人來說，有的在農村，但是想方設法要擠到城市裡；有的在城市，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優越感。他們瞧不起農民，眼裡、心裡都沒有我們的八億農民。而你們眼裡、心裡是有八億農民的。儘管你們現在是小人物，沒有資望，可是只有真正把自己貢獻給八億農民，那就代表了中國前進的方向。這樣的精神生活是高尚的，豐富的」。而另一位對農村改革作出傑出貢獻的老人，被發展組的年輕人認為「可遇不可求的忘年交」的杜潤生，更是出語驚人：「農民不富，中國不會富；農民受苦，中國就受苦；農民還是古代化，中國就不會現代化。農民定，天下定」。如本書作者所說，杜老這句話讓發展組的朋友終身難忘，一生受益。在講話中，鄧力群、杜潤生都強調「把農村發展問題當作科學來研究」的重要性。杜潤生談到歷史的經驗教訓：「黨如果根據假情報、假彙報作出決策，那是非常危險的」，「決心建立在不科學的基礎上，最後造成嚴重的後果」，而這樣的失誤造成的災難「到頭來都轉嫁到人民身上」，特別是使農民蒙難。鄧力群則指出：「要堅定地相信，富有生命力的東西，永遠來自人民，農村問題方面富有生命力的東西，必然來自八億農民」。他們都表示「對青年中有志於研究中國農村問題的同志的支持」，期

待自己「去見馬克思之前，可以看見從你們中間出現一批全心全意為八億農民服務的農業科學家、農業經濟學家」，並諄諄告誡：「研究工作不能怕犯錯誤。害怕被別人否定，就要自己先否定自己」。——今天，我們重讀當年這兩代人的對話，是不能不為之動容的。這意味著，或者說象徵著，和中國農民有著血肉聯繫的兩代人：經歷了農民革命戰爭和社會主義時期農村曲折歷史的中國共產黨人中的優秀分子，和經歷了文化大革命上山下鄉的鍛煉，中國共產黨培養出來的年輕一代中的傑出者，在 80 年代初的歷史轉捩點上，歷史性地相遇了。它集中了當時還保有生命力的中國共產黨的幾十年革命和建設積累下來的變革要求和變革力量，在這樣的自身要求和力量的推動下，就有可能接受、適應、支持中國農民在新時期以「要求農民決定自己命運的自主權」為核心的變革要求，並加以積極地引導。正是這樣的順應民意，尊重八億農民的意願，新時期中中國農村改革的道路，中國經濟、社會變革的道路，就由此而打開、打通了。

當然，這裡的關鍵，還在最高領導層的決策。人們注意到，從 1978 年農民包產到戶運動發軔，到 1980 年 9 月最高層作出正式肯定性回應，其間有兩三年的暫不作結論的任其實踐發展和自由討論的時間，這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是少見的，也不乏客觀原因（如最高層正在進行權力的轉換），其實是開創了一種新的領導方式的，即充分尊重人民群眾的實踐發展與創造，在實踐與決策之間保持一個時間的距離，有一個觀察、調查、研究的過程，這其實是保證決策的科學性與穩定性所必須的。80 年代初期就是如此。1980 年 2 月，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增選胡耀邦、趙紫陽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新成立了以胡耀邦為總書記的中央書記處，以後趙紫陽又擔任了國務院總理，這就基本上建立起了「鄧、胡、趙領導體制」的新格局。而鄧、胡、趙體制首先面臨的，就是如何回應農民包產到戶的要求。1980 年 5 月 30 日鄧小平首先表態，他也是根據安徽農民的實踐經驗，看到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出於

他的「關鍵是發展生產力」的基本指導思想而表示支持的，他指出：「現在農村工作中的主要問題還是思想不夠解放」，因此，政策還要「放寬」。^⑦ 趙紫陽和新任國務院副總理、負責農村工作的萬里，隨即組織大規模的調查。前述陳一諮的《關於安徽省農村實行包產到戶的考察報告》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經由鄧力群的推薦，而引起最高決策層的關注，他的中國農民的包產到戶運動是「農村的曙光，中國的希望」的論斷也得到了高度認可，為 1980 年 9 月《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幾個問題》的中央文件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這也是此後民間研究介入中央決策的一個開端。正是這一中央文件，正式給農民的包產到戶以合法的地位。——這是一個歷史的重要轉捩點：鄧、胡、趙領導體制選擇支持農民的要求，從而使他們主導的改革首先得到了八億農民的支持。並以農村改革為基礎，這就完全打開了改革開放的新局面。這與 1962 年毛澤東拒絕農民的要求，而產生一系列嚴重後果，形成了鮮明對比。

發展組引起決策層的重視，還有更深刻的原因。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將黨的重心由階級鬥爭轉向經濟建設，就意味著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而這樣的轉變，也就同時要求決策方式的轉變，這就是 80 年代中期由萬里所概括的「決策的科學化與民主化」的問題，實際上鄧、胡、趙領導體制形成時就面臨著這個問題。而所謂「決策的科學化」，要將決策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就必須有為決策服務的科學研究機構，這樣的研究機構又必須是多學科的，綜合的，並且能適應改革開放的新形勢，及時吸取國際最新資訊和資源；但毛澤東所長期奉行的批判封、資、修的文化、教育政策所形成的自我封閉，根本不能提供相應的研究人才。這樣，在 80 年代初期，黨內的決策部門，以致整個中國的知識界、學術界，都面臨著知識補課和更新，以實現知識結構的大調整的任務。正是

^⑦ 鄧小平：〈關於農村政策問題（1980 年 5 月 31 日）〉，《鄧小平文選》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在這一點上，發展組的年輕人，顯示了特殊的優越性：不僅在發展組集中了一批具有自然科學的良好修養，同時又有進行社會科學研究的興趣和能力的人才，從而具有進行多學科綜合研究的優勢；而且由於年輕，有一定的外語基礎，又無包袱，就相對比較容易進行知識的補課和更新，發展組在這方面又有高度自覺性，迅速調整了自己的知識結構。這正是最高決策層所看重的。趙紫陽評價說：「他們上過山下過鄉，他就知道中國的實際情況，他們學過好幾種理論，而且他們的思想沒有什麼局限，應該把他們組織起來，為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出力，也為中央和國務院服務」。^⑧

這裡還有一個決策民主化的問題。在毛澤東的體制裡，也有過「政策研究室」這樣的研究機構，但它是為領導個人獨斷決策服務的秘書班子，是依附性的。鄧小平也延續了毛澤東的思路與做法。只有胡耀邦、趙紫陽這樣的具有新的胸懷、眼光和民主作風，善於接受新生事物的領導人，才有可能接受一種新的更為民主的決策方式。趙紫陽是在1981年底，看到安徽滁縣地區農村調查綜合報告《「包產到戶」地區農村發展的問題和趨勢》，才注意到發展組的。趙紫陽在主持經濟體制改革時，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處處受到現行官僚體制的掣肘，他深感「只是在體制內兜圈子，轉來轉去，始終難以『活』起來」，他的辦法就是「發展體制外的非國有經濟成分，這一塊先搞『活』了」，以此推動體制內的改革。後來趙紫陽總結說：「這是中國改革的特色」。由此而形成了「趙紫陽的改革策略」，既是繞開現行官僚體制，在體制外尋求突破。趙紫陽正是從發展組看到了繞過官僚體制，把體制外的，更具有現代思想和知識，更具活力的年輕人吸納到體制內，又保持相對獨立性，進行創造性的改革研究，成為決策的另一種資訊來源的新的可能性。——這樣，具有民主意識，開放和改革精神的新的黨的領導人，也和具有活力的，來自民間的年輕一代的改革

^⑧ 陳一諮：《中國改革和八九民運》，聯經出版社1990年。

者，歷史性地相遇了。

1982年2月，也就是發展組成立一年以後，中央書記處專門開會，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等一致同意，用幾年時間，從各大學選拔300~400個插過隊，考上大學或讀研究生的年輕人到各研究機構和有關國家部門，從事農村改革研究，發展組也因此站穩腳跟。

歷史作用、經驗和啟示

這是今天人們回顧、總結那段歷史時，經常提到的：從1982~1986年，中共中央連續五年發表的「第一號文件」，都是有關農村改革和發展的「戰略性文件」（胡耀邦語），而發展組都以自己的獨立研究，參與了相關的決策和文件起草。這裡，無妨將每年的改革主題排列如下：1982年，正式承認包產到戶的合法性；1983年，放活農村工商業；1984年，疏通農業和農村流通管道，解決發育市場機制的宏觀問題；1985年，正式取消統購統銷；1986年，增加農業投入，調整工農城鄉關係。這背後顯示的，正是中國農村改革，以致整個中國改革的發展歷程：由包產到戶為突破，逐步推動農村體制的全面改革，農村經濟的全面發展，引發農村社會的深刻變革；並以農村的變革為基礎，逐步推動國民經濟的全面改革和城市的變革發展，整個改革進程深刻而有序。再認真看一看同一時期農村發展組的主要調查報告，其中的相關性，一目瞭然。

如前文所說，中國的改革一開始，就提出了「什麼是能夠撬動整個改革」的「阿基米德支點」的問題，人們曾對此提出不同的設想，並有過不同的爭論與努力。現在，實踐表明，農村經濟、社會和體制的改革正是這樣的終於找到了的支點，它符合中國的國情和民意，從一開始就得到社會各階層的支持，在八億農民那裡獲得了深厚的群眾基礎，並且比較容易為現行體制所接受，因而幾乎沒有引起社會動蕩，所付出

的社會成本最小，卻取得了最有效的成果。最重要的是，這樣的改革支點的選擇、認定與運作，並非少數人憑空設計，而是首創於農民的實踐，又得到執政黨的基層、中高層幹部的廣泛支持，和黨內和社會上的知識分子的積極參與，最後成為最高層的決策，並化為有組織、有領導的國家行為，這是一個自下而上的創造、發動和自上而下的組織、推動，上下結合、互動的歷史過程。而發展組的年輕人，正是在這一過程中，起到了溝通上下，提供理論支持的作用。有人說，他們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特殊群體，既深入最底層，最邊遠的農村，不僅和普通農民，而且和村、鄉、縣、地、省各級幹部都有平等、隨意而有深度的交流，同時又有直通最高決策層的管道，就可以發揮「上下通氣」的特殊作用。而他們的通氣作用又自有特色：其一，他們的民間身份，和體制既「在」又「不在」的特殊關係，就使得他們所傳遞的資訊，較少官僚體制的過濾，更為真實，更具原生性。其二，他們年輕，既無思想負擔，更無特殊利益，就更能直言無忌，也更能反映公眾利益訴求和意願。其三，他們又是一群具有高遠目標、視野，有著良好的專業訓練，理論興趣、素養與能力的青年知識分子，因此，他們能將普通民眾的意志提昇為戰略思考，形成有關改革全局和具體操作的真知灼見。這就是80年代發展組能夠引起決策層的特殊關注，在鄧、胡、趙領導體制下，能夠發揮特殊作用的原因所在。他們的作用，其實也就是毛澤東當年所說的覺悟的，和工農相結合的青年的「先鋒和橋樑」作用。只是在80年代的特殊條件下，他們的這種先鋒和橋樑作用發揮得更為充分，而且具有相對的獨立性。這是歷史所賜予的特殊機緣，今天回想起來，自是彌足珍貴，令人懷想。

更應該珍視的，是那段歷史所留下的經驗。我以為主要有四條。

第一、如前所說，發展組，實際也是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改革，從一開始，就確定一個基本信念：「富有生命力的東西，永遠來自人民」（鄧力群語）。這裡包含兩層意思：一

是改革的基本動力來自人民，特別是社會底層的民眾，因此，必須順從民意，「把人民的事情交給人民自己去選擇，這是他們的權利」（杜潤生語），並以滿足、維護、發展大多數民眾的利益和權利為改革的出發點與歸宿，並以此為衡量、評價改革，檢驗改革成效的標準。二是改革的思想、道路、方針、政策，應來自人民群眾的實踐，因此，應該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尊重他們的實踐經驗和民間思想創造，並加以提昇和引導，形成改革理論、戰略、政策，反過來指導實踐。由此而確定的原則是：「不是自然界和人類去適應原則，而是原則只有在適合於自然界和歷史的情況下，才是正確的」。這就是「從實際出發，而不是從原則、教條出發」；而所謂「實際」首先是中國的實際。也就是說，中國的改革，要從中國的具體國情出發，要尋找一條適合中國的獨特的改革、發展道路。

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改革發展在其初期與中期，走的就是這樣的道路。可以看到，前述「以農村改革為支點」的中國改革，其一，它不是某一個領袖或某個領導集團，頭腦裡的主觀臆想、主觀意志的產物，這就從一開始就避免了毛澤東時代走向空想社會主義的陷阱。其二，它也不是照搬某個外國經驗，它從一開始就是從中國的國情出發，選擇了一條人類改革、發展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產生於中國農民自己的實踐，並符合中國實際的獨特而獨立的改革、發展道路，這也就避免了一些落後的發展中國家照搬外國經驗所造成的弊端，以及嚴重後果。其三，它更不是從某個既定的理論、原則出發，用僵化的理論與原則去規範實踐，而是面對新的現象，新的實踐所提出的問題，新的實踐中所形成的新的實體與結構，從中總結出新的改革理論與戰略。它更不是以是否符合某種既定理論與原則，作為衡量、評價改革的標準，避免用僵化的理論和原則去限制改革，而是以「是否順應民意，是否有利於中國大多數老百姓的生存與發展，是否有利於國家與民族的發展」作為衡量改革成敗的唯一目的與標準。這樣，中國的農村改革從一開始就避免了、或者說超越了長期困擾著中國改革的「姓資，還是

姓社」的政治爭論，如發展組的《農村經濟變革的系統考察》裡所說：「包產到戶到底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這樣的『大是大非』的前提沒有解決，你討論它如何運行，它不是顛倒了問題的順序？但這偏偏是生活的順序」。尊重「生活的順序」，而不是抽象的理論原則和強加於生活的主觀原則與意志（這樣的主觀原則和意志的背後實際是既有舊體制中形成的既得利益的直接或曲折的反映），「在求實精神的火焰中反復錘煉理論思維」，「不斷從現實的變革中汲取豐富的養料」，這正是發展組和80年代改革獲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晚年的趙紫陽又將這樣的經驗作了理論的提昇。他指出：「過去正是靠理想的設計，從而走上了空想、烏托邦」，這確實是深刻的歷史教訓：按照預想的「理想社會模式」來強制社會的發展，按照未加檢驗，也未加反思，因而成為先驗的理論觀念、邏輯來指導社會發展，並且以是否符合「主義」作為衡量社會實踐的標準，這樣的強制性的「社會主義實驗」，是曾經帶來災難的。趙紫陽因此提出要「超越主義」，而另立社會發展的兩個新「根據」，一是「民意」，也就是「人們內心裡的需求」，社會改革和發展的動力應來自大多數民眾生存、發展的需求，並以是否充分滿足人民的生存、發展願望為衡量標準；二是「實踐」，「社會形態是實踐發展的產物，一切要經過實踐的檢驗；經過實踐的檢驗，該是什麼形態，就是什麼形態」。^⑨ 這樣的並非預先設計，而以「民意」與「實踐」為基礎的改革，才能得到廣泛的民意支持，真正化為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實踐，並不斷從民眾的實踐中獲得新的改革想像力和推動力。這應該是80年代初、中期中國以農村改革為支點的改革的基本經驗。

第二，80年代的農村改革，雖然一開始就確立了要突破現行人民公社體制的目標，但在具體推行時，卻沒有立即衝擊

^⑨ 《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參看錢理群：〈中國改革向何處去——觀察與思考之一〉，收《知我者謂我心憂：十年觀察與思考》，（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

人民公社體制，而是先保存其原有軀殼不變，而著力於具體的基礎性的漸進變革，首先從實行包產到戶即家庭聯產承包制開始，恢復家庭作為生產單位和消費單位的功能；再發展專業戶，促成農村分工分業的迅速發展；由此推動農業和工業、商業、交通、金融等各業的結合部的變革，引發農村交換領域的變革，發生、形成和發展新興的、非傳統的市場，如勞務市場，農機、運輸服務市場，農村技術市場，和農村工業品專業市場等等；農村市場經濟的形成，又導致了農村分配體系的變革。這樣的農村生產方式，流通方式，分配方式的基礎變革積累的結果，就必然導致作為上層建築的原有的集生產經營、流動、分配管理於一身的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的自然瓦解。如本書作者所說，「作為當年三面紅旗之一的人民公社體制，倒得這樣悄無聲息，消失得這樣沒有脾氣。可見，基礎性的變革是最根本的變革，與之不相適應的上層建築，用不了多少時間，必然變動。在社會變革中，如果上層建築屹立不動，那只能說，基礎性的東西還沒有變革」。——這是一個重要的經驗：改革，特別是中國這樣的幅員廣大，人口眾多，情況複雜，專制體制根深蒂固的大國的改革，一要著眼基礎的變革（基礎的變革必須是全面的，既包括經濟基礎的變革，也包括思想、文化，國民精神即「文明的改造」），二要注重量變的長期積累。基礎變革不徹底，量變積累不充分，上層建築的變革只能是局部的，甚至在一定時期還要保留其軀殼；基礎變了，上層建築金字塔就自然倒了。如發展組的主要骨幹何維凌所說，絕不能幻想「僅僅通過上層建築的一種理想化模式轉變，就可以把整個中國引向進步和發展」；相反，如果不下力氣進行基礎性的變革，只簡單地引入某種上層建築模式，即使在他國是先進的，在中國也會變質，說不定「會帶來更壞的制度」。

第三，發展組的民間參與，立足於科學研究，又特別重視和突出「戰略研究」，這也是一個重要經驗。發展組曾寫有《論戰略研究》的指導性文章，明確區分了「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與「戰略研究」，指出：「基礎研究」的任務，是「提出

與人類相關的價值標準，確立目標及評價標準」，「表現為概念、理論、原理和原則，對人們的行動不具有人為的強制性」；「應用研究」則要「提出近期的目的、行動和由誰採取行動，它要提供行動的方針」，發佈「指令，法令，試圖對人們的行動進行行政或法律的規範」；而「戰略研究」則「要解決在較長時期裡，為了達到某種總的目標，從可能性到現實性的轉化途徑，主要是對可行性進行研究」，「最後提供幾種可供選擇的可行方案及其預測結果」，「帶有較強的主動性和功利色彩」。它是「基礎研究到應用研究的橋樑」，「缺少了這一環，基礎研究的成果則長時期束之高閣無人問津，或則無法得到及時的綜合以發揮最大的效用」，「應用研究的方向就難以把握，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和一致性也無法保證」。文章如此總結中國的歷史經驗：「建國以來，我們既有作出正確的戰略選擇而使社會大大進步的經驗，也經歷過選擇了錯誤的戰略帶來的災難，又深受沒有明確的戰略造成的政策多變之苦」，而當下「在正面臨一個鉅大轉變的中國」，其所涉及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論和現實問題，「無不具有或大或小的戰略性質」，創建和發展銜接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戰略研究，就成為新時期改革研究的一個關鍵性環節。文章強調，這樣的戰略研究必須是「同決策人分開」的相對獨立的專業化研究，也就是說，這裡有一個戰略決策方式的根本轉變：改變僅「由少數決策者憑著一般原則的指導、憑著經驗和直覺進行戰略分析和決策」的狀況，「分離出戰略研究作為獨立於具體決策之外的」專業化研究，提供決策的科學依據，實現掌握決策權力的政治家與戰略研究專家的結合。這裡的關鍵，就是戰略研究及相應的研究機構，既要為決策服務，又要有相對的獨立性，保持某種程度的超脫地位。——80年代的中國改革之所以能夠做出正確的戰略決策，又能夠實現具有前瞻性的有序推進，較好地保持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和一致性，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決策的科學性：它是建立在理論研究、戰略研究和應用研究三者的有機結合基礎上的，其中戰略研究的特殊作用是十分明顯的。

我們今天來看發展組當年的調查研究與專題研究（本書對此有詳盡的介紹與論述），就可以發現，他們的報告與研究的最大特點，就是具有戰略的眼光。我對於其所涉及的領域不甚熟悉，因而難以作出全面具體的評價和分析，只能以我所感興趣的「西藏調查」為例。這份報告最引人注目之處，就在於它明確提出了西藏改革的戰略思想。報告尖銳地指出：「對民族宗教問題的現行政策，拖住了西藏改革、發展的後腿。為掌握戰略主動權，必須從新的角度出發，調整民族和宗教政策。光靠化錢買不來民族團結，關鍵是重新發展西藏文化，加強對民族自強心理和宗教積極作用的利用，積極創造宗教改革的條件」。這裡實際上是提出了必須改變西藏改革的戰略思想的問題，其關鍵又在要解決對「西藏改革的動力和主力」的認識。報告指出：「民族地區的發展，最根本的還是要靠本民族的進取性和奮發精神」。由此而引申出兩個重要結論：一，「民族意識是振興西藏的動力，而不是包袱和障礙」，「在民族意識中佔首要地位的，是保持、維護本民族的固有文化，並以此來取得與其它民族尤其是漢族平等交往的權利」；二，「西藏知識分子階層、幹部階層和青年職工」這些民族精英應該是「西藏振興的主力」，「他們民族意識最強」，「對民族落後導致的事實上的不平等深有感觸，由此煥發出強烈的民族奮發精神」，他們「集傳統與變革的因素於一身，是對內改革對外開放不可或缺的人才」。報告一針見血地指明，西藏改革發展戰略指導思想上的誤區，就在於我們長期以來，一直「擔心發展西藏文化會延緩社會進步，破壞民族團結，影響祖國統一」，將西藏民族意識誤認為民族分裂主義的思想基礎，因而視動力為阻力，竭力壓抑、以致企圖消滅民族意識和宗教；同時將具有強烈民族意識的西藏知識分子、幹部、職工，視為民族分裂勢力或其社會基礎，變改革主力為打擊對象。報告的結論是：「我們絕不能把西藏的發展和現代化理解為內地化和漢化，等同於以漢代藏，因為這恰恰會延緩社會進步，破壞民族團結，影響祖國統一」，必須真正依靠西藏知識分子、幹部和職工，

以他們為改革主力，「下力氣搶救、繼承、弘揚西藏文化」，以此為西藏改革與發展的立足點，這樣才能真正取得「戰略主動權」。——我們今天重讀這份 1984 年提出的報告，不能不有許多的感慨。因為直到現在，我們在西藏改革、發展的戰略思想，還沒有走出「用錢來買團結」的「經濟決定論」的誤區，繼續把「西藏的發展和現代化理解為內地化和漢化」，依然將西藏民族意識視為改革、發展的阻力，繼續打擊具有強烈民族意識的西藏本土的知識分子和幹部、職工中的精英，其結果依然如當年的報告所說，「壓制、打擊民族意識」，「不僅失去動力和主力」，而且只能逼使民族意識「走向偏激，造成民族隔閡和社會失控，越防範，越動亂」。20 年前提出的戰略思想，今天依然保有生命力，這是很能說明發展組的戰略研究由於它的相對獨立性與超脫性，所具有的特殊價值。

第四，發展組在最初的《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計劃的總體設想》裡，就強調了隊伍建設的問題，提出了參與研究人員的三個條件：第一，有不謀私利的獻身精神；第二，有優良的政治和學術品質；第三，有獨立研究和工作能力，簡言之，就是「積極，正派，有能力」。在前述《論戰略研究》一文裡，又對研究者，特別是戰略研究者的素養提出具體要求：第一「必須是具有專長的通才，必須具有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乃至工程技術方面的訓練」，其二要「保持對日常事務應有的敏感和豐富的形象力，始終站在科學前沿」。文章還特別強調了「培養造就具有時代眼光的全面發展的人才」的重要意義：「尤其是對青年一代，使他們從學習時期開始，就能從戰略的角度考慮問題，將對我們國家未來的命運，產生深遠而積極的影響」。——在我看來，這都是抓住了要害的。人，始終是根本；改革與發展，是需要人，而且是一個個具體的人，去具體實踐、創造的；因此，參與、推動改革、發展的人的素質，精神狀態，是決定改革與發展的方向與品質的。我讀《湖聚潮散》一書，最感興趣，最被吸引的，就是關於發展組「一群人」的描述與分析。這是怎樣的「一群人」啊：他們或「追求

完美主義」，「最感興趣的是不太有答案的一些問題」，「拒絕盲從的附會」，「常常把外部衝突轉化為個人的內在衝突，讓自己備受煎熬」，在煎熬中「釋放才華，激發靈感」（王小強）；或「對研究方法論有深厚的功力」，「常常看得更寬，想得更遠」，「能跳出農村，把農村和更大的系統，比如說跟整個國民經濟，整個國家，乃至世界經濟聯繫起來考慮，使大家眼界更開闊，更多注意到系統和系統之間的關聯」（何維凌）；或「在討論中往往能抓住最主要的環節和問題」，「幾乎關注當今中國社會的所有問題」，並且習慣於從「戰略的角度」去思考，「只關心問題、關心研究、關心成果、關心（是否有實實在在的）『乾貨』」，是一個「做大學問的人」（鄧英淘）；或「思路極其活躍」，「想像力極其豐富」，「話題不斷切換」，「充滿思想火花」，「把研究當作藝術來做」，思考和交流都能「產生美感」，同時「內心無所畏懼」，「見多識廣」而「大度」（羅小朋）；或「以勤奮和智慧，敏銳和亮劍精神征服了許多人」，「總是給現實中創造出來的東西以很高評價」，強調「主要精力要放在科研上」，「在人與人關係上簡單一些，不要複雜化」（周其仁）；或具有極強的「協調能力」和「組織能力」，又「重感情，重友情」，眷戀「中國這塊土地，中國的農民」，真正把研究農村問題「當成自己畢生的使命」（陳錫文）……。在我的感覺裡，這是一群真正能「把苦難轉化為精神資源」的人，文革的磨難，在他們那裡竟然轉化、培育出如此博大、豐富，高遠、深厚的精神品質，如此健康、全面發展的個性，實在令人稱羨。這是真正的大時代造就的民族精華，現在，在「探索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尋求中國農村發展的基本戰略」，實現「中國農村發展，民族振興」（〈認清國情，加強農村發展的綜合研究〉）的時代使命召喚下，聚集在發展組裡，既充分發揮每一個人的創造性，又相互合作，補充，相互吸取，制約，又凝結為一種合力，從而爆發出了鉅大的集體創造力：這是發展組的真正魅力所在，也是他們的成功的秘密所在，更是一個極其寶貴的經驗。

我們已經一再說到，發展組是一個目光遠大的改革群體，他們以農村改革為支點，其目的是要「撬動」整個中國的全面改革。因此，在1985年陳一諮和王小強受命創辦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所，發展組一部分成員隨之轉移到體改所，以後有的又進入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一定程度由農村改革走向整個國民經濟的改革，以致政治體制改革；同時，一些發展組的骨幹，依然堅守農村改革，推動其向縱深方向發展，^⑩ 1986年以後又都轉移到新成立的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與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直屬的農村發展研究所：發展組成員這樣的不同走向，發展組自身的轉型與消散，都是一個自然的發展過程。

而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改革也按照自身的發展邏輯，有了新的發展和變化。80年代初，以農村改革為支點的經濟改革，到了80年代中期，就積累了許多新的問題和矛盾，需要有新的推動，尋找新的改革支點，這就是以城市為中心的經濟體制的全面改革。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1986年鄧小平提出政治體制改革，或許這就是決策層所要抓住的更為重要的新的改革支點。應該說，這也是民意基礎的，1986年所爆發的「十二月學潮」，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都表達了青年學生，以及支持他們的知識分子，民營企業家，工人和市民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兩大訴求：一是從體制上防止腐敗，二是爭取憲法賦予的思想、言論、出版、結社自由，要求更

^⑩ 作為發展組的主要支持者的杜潤生也在一直深化他對農村改革的思考。比如，他在1998年提出的「農民應為『自由人』」的改革方向，要求經濟上給農民以充分的市場自由和遷移就業自由，更全面的經營自主權；在政治上應有相應的民主權利，特別是「應具有談判和自我保護的組織，有自己的代表或代理人」；「農民應成為有知識有文化的勞動者，提高他們的競爭地位，在起點上就處於平等地位」。（〈農民應為『自由人』〉，收《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人民出版社2005年）。1999年，提出積極保護生態環境，「走出一條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路子來」（《我們也可能走持續發展的路子》），2002年又更明確提出「善待天地山河」的命題（轉引自柳紅：《那些人與事》）——這都是中國農村改革與發展的戰略問題。

多的民主權利和發展空間。如前所說，80年代初中期的農村改革，所遇到的阻力和所付出的社會成本，都相對比較小；但80年代後期的政治體制改革，就遇到了遠要複雜的情況，主要有四個問題。其一，改革深入到政治領域，特別觸及體制問題，就會和執政者的既得利益發生衝突，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其二，政治體制改革的主體，主要動力，來自知識分子和民營企業家，工人和市民。他們在毛澤東時代都是不被信任，甚至視為革命對象的；這樣的極左思潮、路線積習影響之下，中共許多幹部很容易將他們的民主、自由的訴求看作是「反對黨的領導」，視動力為阻力。這是和我們前面所說的，和農民有著血肉聯繫的中共幹部比較容易接受農民的訴求，是大不一樣的。其三，政治體制改革所涉及的問題遠比農村體制改革複雜，但在1986年提出政治體制改革時，對相關問題的調查、研究，無論是理論研究、戰略研究，還是應用研究的準備都是相當不足的，這都會增加改革的難度。其四，最重要的是，決策層事實上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內涵並沒有形成真正的共識。但1986、1989年卻不同於1980年，經歷了1980~1986年間的經濟改革所積累的矛盾，此時政治體制改革的提出，不僅在民間社會，而且在黨內也是有深厚基礎的。這樣，在如何對待青年學生、知識分子、民營企業家、工人和市民的政治訴求問題上，黨的幹部之間，以致黨的決策層，就必然出現分歧，並公開化：以胡耀邦和趙紫陽為代表的黨內改革派，認為應順從民意，如同1980年積極回應農民的訴求一樣，將要求民主、自由的學生、知識分子、企業家、工人、市民視為政治體制改革的動力，支持他們的要求，並引導到法制的理性軌道，堅定、積極地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健康有序的發展；而以鄧小平為首的黨內正統派則將群眾的民主運動判斷為挑戰黨的領導權的反革命叛亂。有意思的是，發展組的兩位黨內高層最有力的支持者鄧力群和杜潤生在這個問題上也因發生不同意見而分道揚鑣。這足以說明中國這一歷史時期的複雜性與深刻性。而發展組成員所在的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所、農

村發展研究所也因為在關鍵時刻支持了學生運動遭到解散，發展組的一段輝煌歷史也終告結束。

1989年的錯誤決策後果是極為嚴重的。最重要的是，它根本改變了中國改革的動力和目標：「鞏固黨的執政地位」，也即維護和強化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的既得利益，成了改革的出發點與歸宿。國家和民間，上、下互動的改革也變成了單一的自上而下的，依靠黨和國家的行政權力的強制推動，排斥了民間改革力量的參與和監督，改革也因此失去了廣泛的民眾基礎。這樣，1989年以後的中國改革，一方面，借助於80年代經濟改革積累的基礎與條件，進一步發展市場經濟，從而獲得了經濟的高速增長；另一方面，由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強制遏制，在「穩定壓倒一切」的指導思想下，極大地強化了黨控制一切的絕對權力，不受監督、制約的權力和市場的結合，最終形成了權貴資本階級。本文一開始就說到的，文革後期的民間思想者極為警惕的「特權階級」終於在90年代以後的中國變成了實體的存在。與此同時，則是工人、農民的相對貧困化，80年代農村改革的成果隨著失地農民的大量出現，也逐漸在消失過程中。

這就是我們所經歷的中國改革的歷史：20世紀80年代初、中期，由於順應了民意，作出了正確的戰略決策，及時支持、引導了農民的改革實踐，因此，在上、下結合的努力下，找到了適合國情的以農村改革為支點的中國自己的改革和發展道路，從而以最小的代價贏得了國民經濟的全面改革和發展。而80年代末，由於違背了民意，作出了錯誤的戰略決策，將政治體制改革扼殺於搖籃中，使中國的改革畸形化，造成了新的兩極分化。

而發展組正是和改革同命運：它順應中國改革的歷史潮流而誕生，為80年代初、中期的改革推波助瀾而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又在80年代末中國改革的逆轉中結束生命。它見證了這30年改革的歷史經驗教訓，而給後來者以深刻的啟示。

這樣的啟示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在某種意義上，今天的

中國又面臨著一個新的歷史轉折時期。前述發展組的《論戰略研究》裡，曾經談到：當時（1981年）的中國，還「處於一個戰略上的準備階段」，「我們整個民族需要休養生息、積聚和組織力量，調整各種失衡的結構」，所做的一切，都是為未來中國「轉入戰略上的起飛階段——經濟、社會的大發展時期」奠定「良好的思想理論基礎」。經過此後幾十年的努力，終於完成了前文所提到的現代民族國家的三大歷史任務：今天的中國，達到了空前的統一和獨立，並基本解決了13億人口的溫飽問題，經濟獲得了高速的發展。歷史正在轉入發展組的朋友當年預期的「戰略上的起飛階段——經濟和社會大發展時期」。在這樣的時刻，「中國向何處去」和「怎樣走」的問題再一次提到國人面前，並為舉世所矚目。而中國的老百姓也以自己的實踐作出了回應，提出了自己的訴求。這就是當下中國方興未艾的三大民間潮流：維權，網絡民主和非政府、非營利的民間「自組織」（我們已經說過，發展組正是其濫觴）浪潮。這三大民間潮流明確地表達了今天的中國民意：要求維護普通勞動者（他們正是今天中國的弱勢群體）的生存、發展的權利，要求政治參與權、監督權，要求憲法規定的思想、言論、出版、結社、遊行、集會自由，以此推動政治體制改革，也就是說，今天經濟起飛的中國，必須在實現政治民主、自由、平等上有一個實質性的推進。這既是民意所在，也是中國改革、發展的歷史的必然要求。

中國的執政者正面臨嚴峻的考驗：是吸取1980年的經驗，順從民意，尊重群眾實踐，支持與引導民間潮流顯示的訴求，實實在在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還是重蹈1989年的覆轍，將動力視為阻力，借「維護穩定」之名，對三大民間潮流嚴加防範，對民間維權人士，網絡積極分子和民間自組織的組織者（他們本應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依靠對象）進行圍堵與和壓制？戰略決策的正確與錯誤，將決定中國的命運，歷史的經驗教訓值得注意。

發展組所展示的一些具體經驗，今天也不失其意義。比

如，許多人都注意到當今中國的各級執政者實際上成了救火隊，疲於奔命於處理國際、國內層出不窮的各種問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只有應急對策，而無長遠的全局性的戰略目標與戰略方案。這與「六四」風波之後，感情化地急急忙忙撤銷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農村發展研究機構是有關聯的。由於相對獨立和超脫的戰略研究的缺失，已經成為影響決策的科學化與民主化的制約因素。另一面，學院的理論研究越來越脫離中國現實，應用研究則完全服從於長官意志，所發揮的是魯迅所說的「同意與解釋，宣傳和做戲」的依附性功能。這樣的狀況，繼續下去，必然導致中國改革的官僚化與平庸化，越來越喪失真正的改革必須具有的想像力和創造活力，並且極容易造成決策的錯誤。在這個意義上，我以為，今天的中國，正呼籲發展組這樣的充滿生命力實踐性，具有相對獨立性的戰略研究機構的重建。與此相關聯的，是需要培養什麼樣的人才問題。人們發現，隨著中國社會與教育的日趨功利化與技術化，我們所培養出來的人才，包括所謂的高材生，越來越技術化與知識化，人文關懷、底層關懷、社會責任感的缺失，想像力、創造性的不足，成為今天中國人才的致命弱點，甚至出現了許多高智商的利己主義者，並正在被培養成接班人。今天的中國，也在呼籲發展組曾經有過的人才：志向高遠，和中國這塊土地，土地上的文化與人民有著血肉聯繫，富有獻身精神，同時具有戰略眼光，多學科綜合研究的知識結構，興趣和能力。戰略研究的問題，人才培養的問題，這都關乎中國改革和發展的全局。因此，我們今天回顧發展組的歷史，絕不是為了懷舊；發展組的經驗是指向中國的現實與未來的，它應該在中國的改革與發展實踐中經受新的考驗，得到新的發展：這也是我對本書出版的期待。

錢理群

2011年2月15~23日